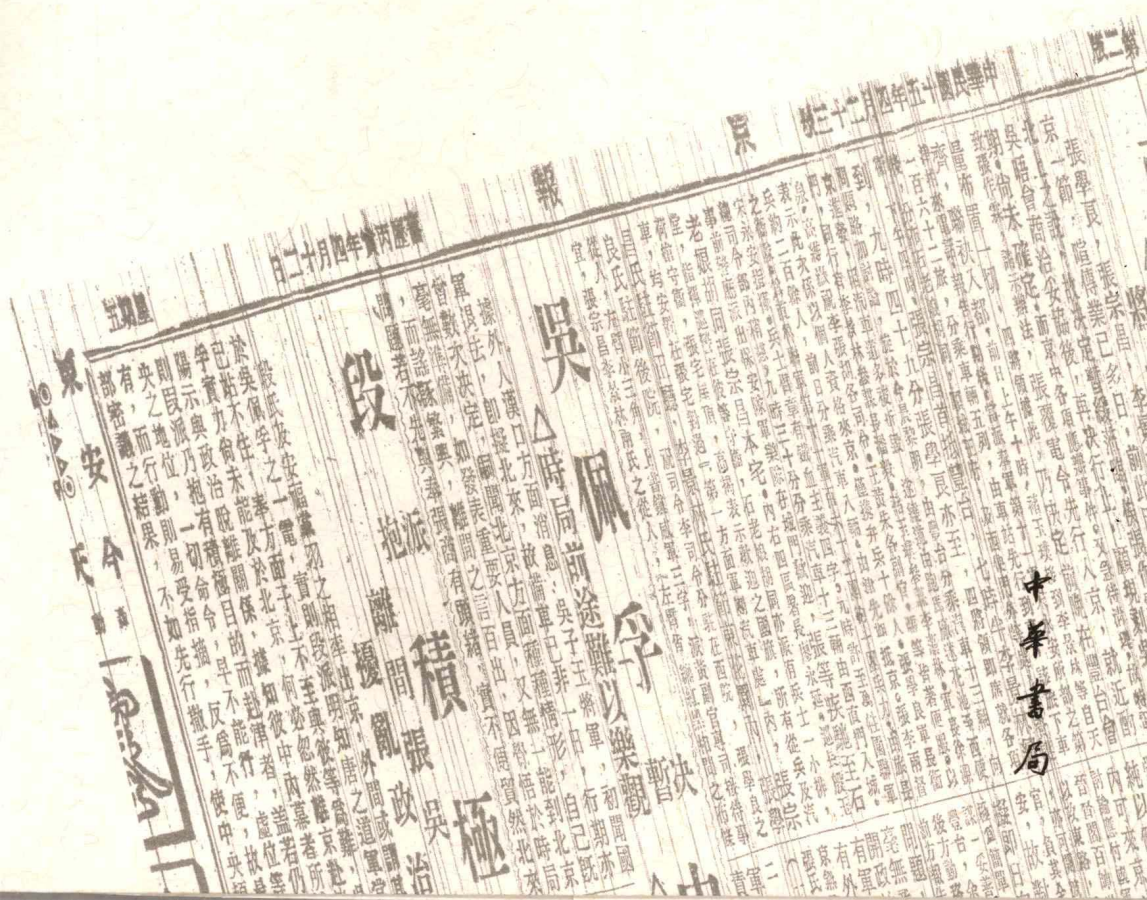


邵飄萍與《京報》

林溪聲 張耐冬◎著

革命時代的翩翩少年
“特別通信”風靡滬上
生死冤家張作霖
萍水相逢百日間



報人時代

邵飘萍与《京报》

林溪声 张耐冬◎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飘萍与《京报》/林溪声,张耐冬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8

(报人时代)

ISBN 978 - 7 - 101 - 06143 - 7

I. 邵… II. ①林…②张… III. ①邵飘萍—生平事迹②京报—史料 IV. K825.42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887 号

书 名 邵飘萍与《京报》

著 者 林溪声 张耐冬

丛 书 名 报人时代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½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143 - 7

定 价 28.00 元

引言 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是有一些普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报业知识分子，作为与公众接触最多、为公共领域服务最为直接的群体，更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以思想、学说、文章济世救国、劝民教民的特色。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 20 世纪，中国报业经历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辉煌，一群杰出的报业知识分子更是令人怀念。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等中国早期的职业报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济世救国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精神气质影响了中国人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回到 20 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之中，怀抱理想的职业记者的出现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自写文章始，就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体现在新闻业上，就是讲究“开民智”、“立民言”，“铁肩辣手”是那一时新闻记者最经典的信条。他们将“道义”与“文章”结合在一起，作为发布真相、号召大众、监督政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现代传媒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生存的压力巨大，广告的多少决定着一家报社的生死，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

也还是时政新闻和社论时评,这几乎已经成了规矩,对报人和读者来说均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的体现。

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追寻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到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的思想轨迹,不难发现,他们都把报刊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力工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评价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看的就是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上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力度,而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被放在了最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新闻人身上的理想主义是具有血脉道统的。那么为什么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的殉道会使记者这个职业光芒万丈呢?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和生活传统说起。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这样定义报刊的功能。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的很多做法其实就是一种做秀,是不得不做出来给选民看的,但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的,甚至可以说,通过媒体给民众留下好的印象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在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挑战他们的力量的情况下,践踏民意,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们可以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禁令和新闻检查来压制和管理舆论。中国的数千年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处于这样的制度之下,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习惯于高压政策。

早在两千八百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召公谏周厉王弭谤:“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对待百姓要让他们畅所欲言，说出真心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厉王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高压手段，致使人人自危，路上熟人相见，只敢以目相视。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在丞相李斯建议下颁布了一道法令，实行言禁，其结果如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记载：“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到了汉朝，太学生因为议论朝政，攻击宦官专权，而酿成了“党锢之祸”。据记载，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严格禁止士民谈论国事，甚至出现三人以上“无故聚饮”也要被科以重罚的案例。后朝的管制更加严厉，宋朝时因为谈论时事而被“刺配”、“流放”、“斩首”处分的记载比比皆是。元明清以后，甚至为违背禁令的人设计了很多种灭绝人性的酷刑。

因为言论控制之严厉，忍耐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林语堂在《中国人之德性》一文中这样评述“忍耐”：“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苛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可见，专制制度是将“忍耐”塑造成中国国民性的体制背景，而这种国民性形成之后，进而成为助长专制暴力的温床。

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统治民众思想的国度，办报立言对文人政客来说既是争取书写胸怀、指点江山的阵地，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种两难抉择。

19 世纪初,传教士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从 1840 年到 1890 年的五十年时间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一百七十余种中外文报刊,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读者,也为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出于生计的无奈,他们开始涉足外报,帮助传教士或外商主理笔政,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报人由此诞生。

晚清时期,“启蒙”、“救亡”成为主旋律,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政治改革,报刊的影响力在中国达到一个高峰。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是梁启超。他先后创办的《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成为 1890—1910 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他以自己汪洋恣肆的情感表达和雄辩凌厉的笔锋,感染了那个时代的读者,无论是江南才俊邵飘萍还是湖南少年毛泽东都被他的文章激得血脉贲张,梁启超也进一步夯实了由王韬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的办报风格。从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起伏跌宕,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黄远生、邵飘萍等人横空出世,他们以名副其实的职业报人身份,登上了报业的舞台,并最终有所作为。在他们理想主义情怀的关照之下,记者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不再是早期那种被人蔑视的“访员”。

然而,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呈现出一幅与现代文明对立的现实场景:在政治上,民主共和的政治构想始终无法彻底贯通,甚至出现了渴望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封建式样重建的逆流;在社会生活中,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和残暴的监狱与法庭,依然具有暧昧、狰狞的象征意义;在价值体系的链条上,贵贱、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环环相扣,民本主义仍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时局纷乱积淀，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邵飘萍的这句话表明，他当然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社会现实，而他敢于直面现实，并且挺身而上的勇气，是记者这一职业赋予的秉性和本能。

“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这两句话是著名报人彭翼仲说的，时间比邵飘萍早了二十年。1904年，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针砭时弊，直言不讳。1905年8月，不畏权势的《京话日报》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派人深入王府内部打探真相，并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和评论。

很快，创刊不到一年的《京话日报》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其对民众和政界的影响力已逐渐显现。《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对其赞誉有加：“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然而，不幸注定会到来，1906年9月，《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因讥讽当时深得慈禧宠幸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而被封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均遭逮捕。作为连续出版物，《京话日报》只存活了七百五十三期，彭翼仲更为“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流放新疆。

1926年4月，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月，著名报人林白水同样因言致祸，被张宗昌下令枪杀。“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和林白水被杀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堵塞言路的典型案例。几年之后，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铁犁”副刊的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触犯《出版法》为由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决。实际上，刘煜生获罪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编发的小说如何反动，而是由于他此前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妨碍了顾祝同中饱

私囊的行为，因而招致嫉恨。同年，还有《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到军方枪杀。

最可怕的政治气氛，并不是专制，而是打着共和的旗号行专制之实，因此鲁迅才说“共和使人沉默”。但是，职业报人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化、政治与新闻理想，而是不屈不挠地斗争着。作为从传统士子营垒中蜕化出来的新型文人，这些早期报人大多饱读圣贤书，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思想中又带有较强的反叛意识。他们的职业理想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但注定会以悲壮的殉道式的归宿为结局，从而实现了作为悲剧英雄的角色定位。

从 1912 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 1927 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当政者频繁更替，但军阀统治的本质却没有任何变化。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政治方面，腐败、专制、独裁几乎是这一阶段的代名词。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又是如何孕育出邵飘萍这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记者的呢？

事实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辛亥革命的成果虽然被窃取，但这场革命带来的民主共和观念却深入人心，广大民众不能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恢复封建专制制度，袁世凯的下场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现存的民国文献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此时期倡言民主、宣传共和主张的正面宣传，还能看到反抗专制、嘲讽暴政的言论，如讥讽“总统门生”沈佩贞对《神州报》的报复行为所作的打油诗。可见，鲁迅的那一句“共和使人沉默”并非此时期报刊舆论的真实状况，传统士大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格言依然发挥着极强的作用。

而且，由孙中山等革命派建构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仍然存在，每一派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后，为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

都不得不在形式上保留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以及其他相应制度，这就使革命派或其他派别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国会来反对政府的某些方针政策，使政府无法完全专行，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就是明例。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政治力量比较均衡，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实际上削弱了严密的专制统治。北洋军阀时期，政权虽一直由北洋各军阀把持，但军阀内部又分为直系、皖系、奉系等各派，各派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他们相互竞争，实力又相对均衡，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派拥有压倒性优势，可以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

而且，凡是动荡、混乱的历史时期，政治控制往往松弛，思想言论趋于活跃，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北洋军阀时期，中国人几千年来第一次有了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进行合法监督的机会。《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创立，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促发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2月初，《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通过报章传出之后，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在民众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最终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难理解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为什么会相对得以发展。

“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邵飘萍能形成这样的新闻观，除了当时相对开放的言论环境的依托和记者职业理想的支撑，西方专业主义新闻理念的影响不容忽视。

西方政党报刊以言论为主，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附于政党的资助，从而沦为政论斗争的工具。随着廉价报刊的出现，西方政论报纸被商业化的新闻纸取代。但在黄色新闻时期，报刊为取得商业利益的最大

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庸俗化的信息取悦受众，没有起到报刊应有的社会作用。

在经历了政党报刊和黄色新闻时期后，西方新闻事业的社会角色开始重新调整和定位，主流报刊开始以“独立”、“客观”、“公正”为标榜的目标。例如，《泰晤士报》声称自己“独立于党派之外”，“有害于公众利益的（消息）一定予以保留，否则，适当而正确的消息均予以发表”。《纽约时报》的首页标题刊登的标语也是“刊登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力图塑造自己“不偏不倚、不党不私”的形象。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

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

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

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

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

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在1941年接受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

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照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早期职业报人虽由传统文人过渡而来,却有着政治家的理想;他们试图通过办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仅仅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他们肩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又履行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操守……

但是,这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却注定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煎熬,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些豪情满怀的理想宣言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那些为理想而殉难的中国新闻人却拥有了生如夏花般的绚烂,那段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断地引人追寻……

目 录

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 /1

第一部分 邵飘萍：报界巨子 新闻导师 /1

一、革命时代的翩翩少年 /2

东阳邵氏 /2

早慧的少年 /7

报界巨子的启蒙者 /8

渐习新风的浙高时代 /10

与“鉴湖女侠”的忘年交 /14

二、以新闻为志业 /16

初执教鞭 /16

25 岁的《汉民日报》主笔 /19

袁氏当国 /23

宪政！共和！ /29

还是做记者 /32

三、东渡扶桑，崭露头角 /34

歌罢掉头东 /34

离乡未敢忘忧国 /37

“称帝门”中的报业丑闻 /43

思想裂缝处的舆论主持者 /46

四、挥笔讨袁，再造共和 /49

阿平者，平不平也 /49

揭破“总统的新装” /51

“唤醒袁君之迷梦” /54	
五、“特别通讯”风靡沪上 /57	
山雨欲来 /57	
第一“特派员” /60	
北京新闻编译社 /61	
南社·老虎总长 /63	
采访艺术与通讯时评 /65	
铁屋中的呐喊 /69	
六、执业治学,中流砥柱 /74	
报业的大时代 /74	
自立门户,《京报》诞生 /75	
《国民》顾问 /78	
立新闻为学术 /80	
七、“五四”大转折 /85	
幻灭的希望 /85	
“五三”之夜 /87	
烽火燃神州 /88	
流亡的日子 /92	
八、新时代与新思想 /95	
书生议政 /95	
著书论马列 /98	
寻求自强:解读马列的基点 /100	
九、特殊的共产党员 /103	
重振《京报》 /103	
“康慕尼斋”的常客 /104	
难求定论的党员身份 /111	
孤证罗章龙 /113	

十、吾国新闻学之泰斗 /115

立德、立功、立言 /115

新闻理论和业务思想 /120

第二部分 《京报》：茫茫暗夜里的曙光 /124

一、创始：面目一新的独立报纸

(1918年10月—1919年8月) /125

铁肩担道义 /126

辣手著文章 /129

别具一格《小京报》 /132

“五四”号手 /134

二、鼎盛：北京最进步之报纸(1920年9月—

1926年4月) /138

革新图强 /138

广告与津贴 /141

公共言论的机关 /146

“女师大”风波 /150

新闻改革的实验园 /152

声名赫赫的《京报副刊》 /160

与鲁迅的一点误会 /163

冲在反帝最前线 /166

呜呼！“三一八” /170

三、凋落：弦断声歇不言悔(1928年6月—

1937年7月) /175

汤修慧其人 /176

后邵飘萍时代的《京报》 /180

毁报纾难 /182

《京报》凋落的反思 /186

第三部分 乱世悲歌：书生报国一枝笔 /190

一、人散曲未终 /190

幸运的失意者 /190

志同道合 /193

倡共和，迎中山 /194

革命尚未成功 /199

二、黑名单上的人 /202

西北军的高级顾问 /202

一份公开的“黑名单” /204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205

三、生死冤家张作霖 /212

枪杆子与笔杆子 /212

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215

春秋绝笔 /219

四、血洒天桥 /221

谁是告密者 /221

小人的报应 /224

以身殉道，以身殉报 /226

五、萍水相逢百日间 /229

一样飘萍身世 /229

千秋白水文章 /230

幸运的成舍我 /233

正气长存 /236

附：邵飘萍与《京报》大事年表 /239